

形象e

Criticism

山东文艺出版社



批评丛书

E pipingcongshu

新新中国的形象

张颐武 | 著

Criticism

山东文馨出版社



张颐武 | 著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新新中国的形象/张颐武著. — 济南: 山东文艺出版社,
2005.12

(e 批评丛书. 第 2 辑/吴义勤主编)

ISBN 7-5329-2499-8

I. 新… II. 张… III. 当代文学—文学评论—中国
IV. I20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5) 第 122072 号

主管部门 山东出版集团
集团网址 www.sdpress.com.cn
出版发行 山东文艺出版社
电子邮箱 sdwy@sdpress.com.cn
地 址 济南经九路胜利大街 39 号
印 刷 山东新华印刷厂潍坊厂
版 次 2005 年 12 月第 1 版
2005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规 格 开本/980×680 毫米 1/16
印张/17.5 插页/2 千字/270
印 数 1—3000
定 价 21.00 元



张颐武，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大学文化资源研究中心副主任。从事中国当代文学、大众文化和批评理论的教学与研究。著有《在边缘处追索》、《从现代性到后现代性》、《思想的踪迹》等著作多种。

瞧，他们走来了（代总序）

吴义勤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中国社会完成了一次巨大的历史转型，这次转型在全面推进中国社会的现代化进程的同时，也给中国的精神文化领域带来了前所未有的迷茫、困惑与创伤。而文学和文学批评则无疑是首当其冲的受害者与牺牲品，文学的边缘化、文学中心地位的失落、商业对文学的冲击、公众对文学的冷淡等等，都使九十年代的中国文学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困窘之中，在此情况下，文学批评的风光不再、饱受诟病也就更是自然而然的了。不仅如此，九十年代以来中国文学和文学批评的困境还来自于其自身的压力，那就是八十年代中国文学及文学批评与意识形态“合谋”而形成的“繁荣”，已经事实上构成了九十年代中国文学及中国文学批评的一道挥之不去的阴影。不打破这个“神话”、消除这道阴影，九十年代的中国文学和中国文学批评的“真相”就会被遮蔽，就不可能得到客观和公正的评价。

仅就九十年代以来的中国文学批评来说，“缺席”、“失语”的指责可谓不绝于耳。但这种指责又在多大程度上是接近真相的呢？许多人在怀念八十年代文学批评和文学批评家的背景上，面对一大批八十年代成名的文学批评家在九十年代纷纷离开文学批评现场的事实，发出“缺席”、“失语”之类的感慨其实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但是他们不能据此忽视另外一种事实：那就是在八十年代批评家离场的同时一大批九十年代批评家的登场，以及这代批评家在九十年代的批评业绩。真相也许是这样的：一代人走了，又一代人来了，但是对上代人怀旧、挽留、痴情甚至有些怨艾的目光，模糊了我们的双眼，使我们对新一代人的成长与奋斗视而不见。

这其实也就是我们策划这套“e批评丛书”的背景。关于九十年代的中国文学批评，我们有自己的判断，我们不认同所谓“缺席”、“失语”之说，更不认为九十年代的文学批评对比于八十年代就是后退了，相反，我

们更愿意把九十年代看做文学批评回归其本体的一个过程，这个过程也许还够不上“超越”、“突破”之类夸张的说法，但是它前进的步伐却无疑是坚定而有力的。我们选择的十位批评家大多出生于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他们在九十年代取得了丰硕的批评业绩，他们的地位、名声和影响也许还无法与八十年代那批批评家相比，但是他们有自己全新的追求，他们第一次“集体亮相”也算得上是对一个时代文学批评成就的一次总结和展览。这套丛书不是宣言，也不是证明，而是一次货真价实的“呈现”与“展示”，这代批评家将用他们最优秀的批评文字标示一个新的时代的到来。

“e 批评丛书”最终能够面世，首先要感谢的是山东文艺出版社的路英勇社长。早在二〇〇〇年深圳大学的一个学术会议上，我、洪治纲和谢有顺就有了这套丛书的设想，后由于种种原因一直未能如愿。二〇〇三年十一月份，山东文艺出版社的路英勇社长和陈光新总编邀我、张清华、施战军和黄发有四位在出版社召开了一个选题座谈会，我谈了这个选题，得到了路社长的热情响应。他对九十年代的文学批评非常熟悉也非常关注，当即就给这个选题以很高的评价。后来几天，我又和路社长进行了几次热烈的长谈。我拟了这代批评家二十人的名单，最后由路社长和陈总编定下了出版两辑的规划并圈定了两辑批评家的人选名单。就连“e 批评”这个丛书品牌也是我和路社长在长谈中确定的。在我们的理解中，“e”时代既是二十一世纪信息时代的指称，又是一个指向未来的不确指的年代，它是告别，又是开端。而“e”批评则应是能体现“e”时代文学批评“标高”的批评，它应超越前人，启示未来。因此，对我们来说，“e”批评既是“确认”，又更是一种“期待”，我们期待一流的批评，期待优秀的具有特殊“高度”的批评家。令人高兴的是，由汪政、晓华、郇元宝、李敬泽、阎晶明、谢有顺、何向阳、洪治纲、王光东、施战军等十一位批评家组成的“e 批评”第一辑一推出就受到了文学界和广大读者的热烈欢迎，无论从学术效应还是从发行销售情况来看，都可谓取得了令我们意想不到的成功。这无疑大大增强了我们编好“e 批评”第二辑的信心。此次，王彬彬、张新颖、王干、张颐武、李建军、杨扬、张清华、黄发有、贺仲明、张学昕十位成就斐然的青年批评家再次汇集到“e 批评”名下，我相信，他们的批评业绩和他们个性化的批评风格一定会带给我们新的惊喜。

当然，我们知道，历史不是由自己书写的，“e 批评丛书”同样也不是一个历史的“定本”，它也许证明不了任何东西，但它是一个“平台”，它让这代批评家拥有了交由历史审判与选择的机会。他们就这样走来了，历史也许将会由此被改写。

2005 年春节于济南

自序

编完这本书，正是二〇〇五年的正月十五。窗外时时传来零星的鞭炮声，客厅里元宵晚会的欢笑声也时断时续地传过来。万家灯火中的世俗的快乐和满足已经成为了当下生活里的必然。这种生活可能没有当年的万丈豪情来得波澜壮阔，每每让高蹈的、渴望英雄气概的知识分子感到失望和悲愤，却也是一百年来不断地经历痛苦斗争的中国的一个新的历史篇章，也是一百年来中国难以得到的平常的、却是弥足珍贵的安宁的日常生活。鞭炮声和笑声没有多少深意，只是简单的乐趣，却构成了这个所谓“新新中国”的不可忽视的一个方面。

我突然想到最近看的电视剧《响亮》，那似乎是我这样一代人的过去经历的表述，也是那个直到今天还难以说清的“新时期”初期文化的象征性故事。那部电视剧开始在毛主席去世的时刻，电视剧的主人公牛红梅一家也失去了自己的父亲。这是一个失父的时代，也是许多人试图探索新的道路的时代。那个时代的许多电影和文学作品都会有一个矫揉造作的思考的青年，而那个时代的青年也被称为“思考的一代”，今天看来，那些关于历史使命、关于时代青年的责任等的思考其实是非常浅薄的，就像当时轰动一时的所谓“潘晓讨论”关于“人生的路为什么越走越窄”的情状，看起来有玄学式的高蹈，其实多少有些不着边际。电视剧结尾处是一九八三年的春节，主人公牛红梅经历了许多感情的和生活的煎熬之后，在看第一届的春节联欢晚会。在看到王景愚的《吃鸡》的时候，牛红梅抑制不住开心地大笑，她在欢笑中流产了，但她的父亲却回来了，一个新的秩序开始出现了。我们在那个青春期里不清晰的朦胧的理想却意外地转化为一种世俗的快乐。王景愚的《吃鸡》似乎是难以表述的可笑的场景，但我今天想来，这个无足轻重的小品却有着几乎不可思议的象征性的含义。这个狂热地吃鸡的人物所象征的是曾经有过的那个物质高度匮乏的时代，那个时代给予中国人的印象的确是太深了。对于王景愚本人来说，这个小品来源于他本人在三年困难时期在

广东的生活经验,但它却喻示了一个匮乏的时代人们在极度有限的消费品面前的焦虑和不安。王景愚用如此可笑的方式极度地夸张性地展现了一种世俗的对于“吃”的渴望,其实连他自己也无法理解的是,他是用一种旗帜鲜明的世俗的快乐来伸张日常生活的合法性。历史却在王景愚的表演中破关而出,显示了自己的未来的走向。中国的普通人的选择已经决定了未来的中国的走向,一个新的“中国梦”开始被打造成形。一九八三年的这个普通的春节由于这个充满欢笑的晚会而变得具有了某种象征的意义。《响亮》正是将这种意义在二十多年后开掘了出来。我们可以发现其实中国大历史的走向不仅仅是偶然性的结果,恰恰是千千万万中国人追求实现新的“中国梦”的结果。这种力量比起高蹈的、抽象的理想更为强大。其实我们看到的“新时期”可能就是分裂为两个方向的,一个是高远的理想,一种抽象的“主体”的实现的追求,另一个是世俗的、追求消费满足的潮流。其实后者提供了一种实实在在的欲望,有时它被掩盖在前者的宏大的叙事之下,但它其实是历史中更为坚硬的、难以被化解的东西。二十年来中国历史的走向让很多人感到意外的就是被这种世俗欲望所主导的“中国梦”在发挥作用。更加不可思议的是,正是由于千千万万普通人的世俗梦想,中国也在全球化和市场化的发展中有了一个新的历史机会,中国的“和平崛起”正是这种普通的欲望凝聚的结果。正是这普通的欲望创造了在中国“现代性”中被压抑的潜能和新的历史维度的释放。于是,在现代性历史的追求之上,中国有了一个新的历史机遇和一个新的选择。它并没有否定“现代性”的寻求,却将这寻求转化和重写了。从今天看历史,中国的文化想象中的这个“中国梦”正是一个“新新中国”出现的前提和条件。这个梦决定了今天的中国和中国人的命运。从王景愚的《吃鸡》开始的世俗却并不无聊的历史要求造成了深刻的“历史的讽刺”,让许多人在它的面前失足,让许许多多宏大的理论变成了历史的笑柄。我所希望做的其实是近乎微末却似乎异常困难的工作:理解我们的时代,理解这个看起来俚俗、却意义重大的时代。

这本书里的论文,多数是我进入新世纪以来写作的文学理论批评文字。这些文章是从许多文章中选出来的。它们可以勾勒出我的思想踪迹,也是为理解自己的时代所作出的努力。实际上,我的努力就是试图给予这个激烈变化中的中国文学想象出一个粗糙却并不脱节和玄虚的图景。这些文章延续了我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的“后新时期”以来的工作,也就是给予

这一段中国大历史一个片断的描述。我总有一个感慨，比起我们的前人，我们似乎太看低了自己的时代，其实这个时代的意义可能对于中国来说是最为关键的。我看到了一个从中国现代历史的屈辱和失败中超拔出来的“新新中国”，它并不是由悲壮和决绝的伟大的选择带来的，而是以我们似乎难以理解的平常和平淡的日常生活的进展带来的。我们没有见到耸动的宏伟叙事，却见到了一个社会的高速的变化和成长；没有见到巨大的悲剧和巨大的牺牲，却见到了靠加入全球化带来的中国的深刻而复杂的变化。我并不认为这些变化符合我的理想，但我却不得不承认这变化比我一厢情愿有力量。我必须提供一些阐释和思考来解释这些变化的轨迹，而不是陶醉于自我想象。在那些我无法闭眼不看或简单拒绝的“状态”压迫我、要求我解释的时候，我觉得必须有所解释，而不是掉过头去。我不能不心平气和地面对这个时代和这个时代的文学，因为，我不可能有机会获得不食人间烟火的高蹈和悲愤，我只是试图穿过纷乱而饶有兴味的诸多现象，来试图不断地“阐释中国”。这些文章中让我感到欣喜的是我在九十年代以来“不幸而言中”了一些事情，这些事情在今天已经越来越清晰了，在九十年代被许多人激烈抨击的观点，今天已经是老生常谈了。我不能说有先见之明，只能说还有自知之明，知道自己情不自禁地面对自己的时代，我没有给它简单的肯定或否定的高超能力，于是我宁愿多看到一点点有趣的踪迹，一点点正在延伸和变化的事物。我并没有什么高明的洞见，我只是知道自己的想法其实充满偏见。于是，这项理解时代的工作其实充满了仓促、片面和简单化，但它毕竟有一个特别的角度。

这里留下的一切当然还是初步的，却是我对于这个新世纪中国文学的认真的思考。我希望它们会提供一个进入我们自己时代的孔道和参照。文章依内容分为四编，大体能够看到我在文学领域的研究和思考的“状态”。把它交给读者的时候我仍然感到它们其实是不断提出问题、也就是提出了许多未完成的思考的“点”。我知道这些工作的无足轻重和充满困惑，但我也知道我毕竟提供了一种新的可能。

最后，我要感谢吴义勤和阎晶明的盛情，没有他们也不会有这本书和这个序言。感谢当年发表这些文章的刊物，感谢读者。我还会继续我的工作，继续和大家一起思考和阅读下去。

是为序。

目 录

瞧，他们走来了（代总序）	吴义勤 1
自序	1

第一编 “新文学”的终结

“新文学”的终结	3
跨出“五四”：我们需要超越的精神	23
“回归”想象和“下降”史观 ——“新文学”的终结问题的思考	35
大历史下的文学想象	48
“纯文学”讨论与“新文学”的终结	52
优雅的崛起：中国文学的新空间	60
现实的转变和中国想象的重组	67

第二编 新世纪文学的展开

挥别百年：中国的新生	75
九十年代的中国文学	81
全球化的文化挑战	87
“中等收入者”与文学想象	95
迷乱阅读：对“七十年代作家”的再思考	102
超越焦虑之旅	112
“新少年写作”的意义	116
“跳舞”的启示：“欲望话语”的崛起	121
长篇小说之二〇〇三：困惑中的生机	128



烟云过眼又十年

——十年来中国文学阅读的转变	133
认同的挑战	142
革命的再想象	145
中产化和青春化：新的阅读空间	147
“畅销书机制”与“小众化机制”	149

第三编 追问的延伸

说《帝国》	155
文化研究与中国现状	159
外国文学的“中国性”：我的个人的记忆史	169
反思“经典”	
——后殖民与文化研究的挑战	175
追问人类的精神	
——《布尔加科夫文集》的启示	179
一本特别的书	
——写在《哈扎尔辞典》出版之时	182
“写作的伦理”与“阅读的伦理”	184

第四编 阅读的路径

梁晓声的意义	189
李大卫的幻想生涯	194
斯妤作品的意义	197
倾诉与记忆	
——《离异的人》的价值	200
《无字》：生命的痕迹	202
胭脂？帝国？消费时代的唯美寻求	205
如花时代	208
中国梦的片断	211

青春的褶皱与期望·····	215
对于国家的承诺·····	218
温旧梦 寄遐思	
——《白门柳》的文化关怀·····	221
游戏时代瑰丽想象的展开·····	230
日常生活的再追问·····	233
传奇自有力量·····	237
传奇文学的再兴·····	240
《米香》的故事·····	243
“凡人”或“圣人”：在“新新中国”回望·····	245
在边缘思考·····	248
 跋：理解中国与阐释中国	
——张颐武的思想文化批评理路·····	李祖德 259

第一编 “新文学”的终结

“新文学”的终结

一、“新文学”的话语

所谓“新文学”的概念从五四时代以来一直是描述中国文学发展的最核心的概念。“新文学”的概念超越了“中国现代文学”、“中国当代文学”这样的历史分期的描述，是一种既有历史分期的意义、又有价值判断的概念。虽然一些文学史著作将“新文学”等同于中国现代文学，但显然这一概念并不能够包括如“鸳鸯蝴蝶派”这样的从晚清以来一直存在的文学潮流，而新文学和这些潮流的“斗争”一直是新文学史的主体。“新文学”实际上是五四时代开始建立的一套文学体制的总体概括，是“五四现代性”的集中体现。它具有两个方面的含义，首先，“新文学”与“新文化”相互对应，并且是新文化的最中心和最重要的部分，是“新文化”的皇冠上的明珠。如电影等其他艺术类型的作用和影响远不能和文学相比。其次，“新文学”是和“旧文学”相对而成立的。这种“旧文学”在五四时代和其后的漫长的历史中实际上包括两个方面，一是中国古典文学，一是晚清出现的与市民文化和消费主义相关的“鸳鸯蝴蝶派”的文学。这种文学其实一直与“新文学”共存，却一直被“新文学”所压抑和刻意贬低。由此可见，“新文学”的概念完全超越了历史分期的意义，而包含了高度的价值判断。“新文学”尽管内部存在着激烈的分歧和斗争，却建构了一种等级制的关系和一种权力结构，也是一套完整的话语和生产与消费的机制。“新文学”无论在整个文化中还是在文学内部都是核心的概念和“现代”中国的合法性的来源。“五四”的先驱者正是将“新文学”作为一种高度正面的价值加以倡导的，而此后经过了一系列复杂的“经典化”运作而将有关关于新文学的知识的价值“客观化”（如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之后《中国新文学大系》的编纂和许多选本的出现以及四十年代以来的“新文学史”写作和教学体制的建立）。

在这里,“新文学”绝不仅仅是作家和作品的总和,而是一套复杂丰富的文学体制。这一文学体制首先是中国作为现代民族国家合法性的核心的文化想象。正是它所最为充分地展现的“五四现代性”的启蒙和救亡的二元结构提供了中国作为现代民族国家的话语前提。在王一川、张法和我写于十年前,曾经引起过相当的讨论和争议的论文《从“现代性”到“中华性”》中,我们给予了中国“现代性”一个简单的表述:“它是指丧失中心后被迫以西方现代性为参照系以便重建中心的启蒙与救亡工程。”^① 这个描述来自李泽厚有关启蒙和救亡双重变奏的经典的命题。这种中国“现代性”正是以西方为参照建构起来的,它的基本形构乃是一种宏大的话语。这里所描述的实际上是中国现代性的经典的“五四模式”,这一模式被普遍地视为中国现代性的经典模式。根据李泽厚在八十年代的著名的研究(我们可以将它称为“李泽厚命题”),启蒙和救亡这两种“五四现代性”的不同选择之间的复杂关系构成了现代中国的文化和思想的基本结构。^② 这一“五四现代性”虽然侧重点和倾向不同,但其以中国的民族悲情为基础,以民族国家的建构为目标,以人的实现为理想,共同构筑了宏伟的叙事。一方面中国屈辱的主权不完整的半殖民经验和中国的国际地位的“弱者”形象,形成了“中国”救亡图存、建构百年“强国梦”的历史目标。另一方面,通过启蒙摆脱传统的束缚,获得现代的“主体”和现代的生活方式,得到个人解放,也是一个宏大的目标。“新文学”所表现的正是“五四现代性”的核心。其次,它也是和印刷出版业的发展和现代教育的发达相联系的,是通过书面媒介建构“现代性”宏伟叙事的核心想象。现代出版业当然是建构现代民族国家的最为基本的要素,自晚清以来现代出版业的发达,使得文化的传播更为便捷快速,现代的文化开始确立。而现代教育的普及更使得“新文学”对于“五四”以后崛起的中国年轻的新精英知识层产生了最为深远的影响,支配了他们的文化选择。“新文学”变成了启蒙和救亡的最为直接和有效的方式。实际上,“启蒙”和

① 罗岗、倪文尖:《90年代思想文选》,广西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一卷,第234页。

② 李泽厚有关“启蒙”与“救亡”的论述可参阅李泽厚《中国现代思想史论》,东方出版社,1987年6月,第1版,第7~49页,李泽厚的表述包含了对于“救亡”压倒“启蒙”的质疑的态度,他在一定程度上认为“启蒙”和“救亡”具有强烈的对立的性质。但情况其实比他的描述更为复杂。